

# 《蔣介石日記》原本、抄本之異同 及其內含價值

馬振犢

蔣介石日記是研究民國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其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在當前中外學者爭先恐後發掘這一史料寶庫的時候，我們不應忘記，最早摘錄利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來撰述蔣介石個人歷史活動的，是他早期的秘書毛思誠。我們通過對蔣介石日記原本抄本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可以揭示許多歷史真相，推進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研究。

1927年至1939年間，毛思誠為給蔣介石編修《年譜》等個人傳記資料，收集保存、抄錄整理了一批蔣介石的日記、來往函電、家書公文等文獻，後來依此著有《蔣公介石年譜初稿》（1888-1926）（即《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因此而形成的資料，如今也已形成了另一類的蔣介石個人檔案。<sup>①</sup>

蔣介石日記有手稿原本、分類抄本和仿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後三種原本的衍生品，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都有收藏，其中仿抄本從內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相仿，而日記的“分類抄本”是主體，這些由毛思誠所作的“類抄本”，其基本內容均已為毛氏編入其所著《年譜》中。“日記類抄”與《年譜》成稿後，經過了蔣介石親自審閱刪改，價值更為珍貴。實際上，這是蔣介石為他準備公諸於世的日記做了一次內容修訂，以判別日記中哪些內容是可以公開的，而哪些內容必須刪去以保密；以及日記中一些當時的提法稱呼必須改變以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記類抄”與《年譜》的蔣改版檔案，比較其日記正本，具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

在有關蔣介石的研究中，對比日記原本內容與毛氏抄本及其所著《年譜》一書中的相關記載，其內容文字的異同比較及蔣介石修刪內容的研究，是一項非常有趣而極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可以對照補充日記原本因年代久遠原件腐壞而造成的內容缺漏，而且可以從毛思誠摘錄內容時的取捨改寫、蔣介石審閱時的刪改增批中，窺探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欲達到的目的。我們甚或可從蔣介石刪改日記的過程中窺探出其政治立場、思想變化的脈動。

毛思誠作“蔣介石日記類鈔”和《蔣公介石年譜初稿》，都是以蔣介石日記原本為基本素材，分類摘錄編輯而成，與日記原件相比，其中的改變有三類，一是毛思誠在分類摘錄“蔣介石

日記類鈔”時有所取捨及文字改動；二是蔣介石在審定“日記類鈔”和《年譜》初稿時所做的原則性刪改；三是蔣介石後來的秘書陳布雷等人校定時所做的文字梳理工作。

比較蔣介石日記正本抄本之異同點，其價值意義大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毛氏抄本與年譜，其內容不是原本簡單的照錄與重複，而是經過了編輯、增刪再加工後的作品，其價值更高。

第二，蔣介石日記正本，因保存年代久遠，紙張損壞，許多字跡已經模糊缺漏，難以辨認。但我們對照日記抄本與年譜，就可以做到基本上的補齊與還原，這對提高日記原本價值，具有重要作用與意義。

第三，在這些改動中，以蔣介石對於其日記特別是黨政、軍務、家事類內容的親筆整段刪除與改寫最為顯眼，它體現了蔣氏在其日記即將公示前的政治因素考慮與自我隱私保護觀念，反映出蔣氏的思想變化，因此極具研究探討價值。

毛氏抄本與《年譜》的編輯加工者主要是蔣介石本人、毛思誠以及于右任、陳布雷、吳稚暉等少數人員。因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使得日記的改抄本與《年譜》內容更具價值。這種價值具體體現在加工後的產品與原本相比，已有許多的不同，除了糾錯改誤補漏等技術性改進外，重要的是能夠反映出當事人在事後再回顧時，立場觀點已發生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蔣介石自己在親筆修改日記時，他的感覺與考慮應對問題的思路，比當時的第一觀感反應要更為冷靜和成熟，這便更能體現他真實的為人與面貌。

從日記修改編輯工作實際出發，值得關注的就是毛思誠與蔣介石兩人對日記的修改和刪增的內容。

當年毛思誠為了準備編寫蔣介石年譜時的方便，仿照蔣介石所喜愛的《曾文正公日記類鈔》體例，對蔣日記分為政治、軍務、文事、身體、學行、家庭、旅遊、氣候、雜組等9類做了摘抄，9類名目的確定自然也是毛和蔣的選擇。蔣介石對毛氏所作抄本非常重視，除逐一審改外，還命其將“學行類”“另抄一本寄下以備常覽”<sup>②</sup>，以增加其在身心修養過程中的參考警示作用。

毛思誠在為蔣做日記分類抄本時，基本上是尊重蔣介石日記原文的。但是也並非隻字不改地照抄，而是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潤色和修正。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後加以文字潤色，並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這一改，蔣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實了”。<sup>③</sup>從相關內容的幾次改動來看，毛思誠作類抄時是要把蔣介石的衝動與激憤之言“磨磨平”，蔣介石自己事後再改日記時是要把內容“拔高”，於是，本來生動形象而反映出真實情感的日記，最後就變成了富有官書特徵的說教之言，一聲“公嘆”、幾分嚴謹之中，卻完全失去了原文中“極恨”的色彩與意義，一個血氣方剛又急性暴躁的蔣介石，就此變成了深沉善“耶”的政客，一點“革命精神”也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總體來看，毛思誠的分類抄本在內容上基本是忠實於蔣介石日記原本的，沒有什麼原則改變。字句的修訂和內容分類的鑑別選擇，雖有若干特色或可視為存在某些問題，也不影響對日記

原意的瞭解。只是類抄本被多次審改，特別是蔣介石或于右任等人常常在毛氏舊改字跡上再次改塗，致使頁面較亂，閱讀辨別較為費事。但無論如何，在填補蔣日記原本缺漏字方面，毛抄本仍不失為最好的依據。

至於毛思誠在利用分類抄本寫作蔣介石《年譜》稿時的內容變化，一是基本用其黨政、軍務兩類日記的內容，逐一補充附入了蔣介石相關的講演稿及文字稿，並增加了一些人事任免、命令佈署、軍事動態、來往交際的記載，凡無存稿的還注上了“稿未留”的說明；二是對其文事、身體、旅遊、雜組等，擇其要而錄入，每日氣候雖有專本類抄，但也捨去未錄；三是對其家庭類，則刪去幾乎全部與宋美齡、陳潔如、姚冶誠有關的蔣氏情感生活的記錄，只留下其中能夠公開的內容。而同樣記一事，在年譜稿中也在文字上改為平敘，改寫了含有貶義的內容。如1926年7月26日日記原文與抄本所記“為戰費事，子文吝刻，使人難堪”一語，到年譜稿中則改為“與宋部長切商軍費。”由此可見，《年譜》稿比較類抄的內容要比類抄比較日記原文的內容改動更大，其選材原則與目的是能夠公開和為蔣介石書存正面的歷史。

蔣介石在寫日記時是不準備公開的，所以他在其中記載了許多隱私，但他也知道毛思誠的抄本除了備份之用外，是要用來寫年譜出版的，故他對抄本和年譜稿本在百忙中進行了認真的審改。從目前校勘的情況來看，蔣介石對其日記抄本與年譜初稿的原則性刪改主要集中在政治與家事、個人言論品行等幾方面的內容。分析其情況與原由，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因為政治背景時過境遷，個人立場發生變化，蔣介石對自己過去的講話、文稿中的內容不再認可，需要全刪或全改，以便“與時俱進”。

如1926年8月15日年譜稿存錄蔣介石對第十二師官兵訓話稿中，原有一段他痛斥吳佩孚和帝國主義“討赤”口號的文字，其內容口吻非常革命，慷慨激昂，讀來令人拍案叫絕。<sup>④</sup>但諸如這樣充滿革命激情的文字，卻被蔣介石在審改時以紅筆一圈悄然刪除了，其原因不言自明，這時的蔣介石已經變了，他已不再反帝親俄，甚至，他已經不再“云赤”，甚至還率領“討赤”的隊伍，親自向中共紅軍作戰了！於是，當年蔣氏所發表過的這類相似於共產黨革命的“左傾”言論，自然必須刪除。

二是因為蔣氏個人婚姻的變化，他與宋美齡的美滿結合，使其在對外宣傳中必須避諱乃至完全隱匿他過去與陳潔如、姚冶誠的關係。

1926年前後，正是蔣介石的婚姻關係最複雜的時期。當時他的正式妻子是陳潔如，但與過去的“侍妾”姚冶誠關係未斷，與宋美齡（1927年12月1日結婚）又熱戀，正所謂處於情感糾葛階段。在他的日記中，既有與陳關係的大量記述，又錄有與姚氏的來往，更有許多他傾慕宋熱戀宋的表白。這時，他與陳潔如（1921年12月5日結婚）剛結婚五年，按常理應仍是感情較好之時，實際關係卻已處於“亦愛亦憎”的動搖狀況。其原因基本上是出於陳的某些不成熟和蔣對她的愛仍在、憎又生。實際上，此時蔣對陳還是比較有感情的，故而仍對她“殊勞跂盼”、“不勝牽念”、“情思繚亂”以至“潔如受屈，余心覺不安”等等情感再再出現，而蔣自己也檢討道“近日性躁而僻，潔如耐心侍奉，毫無懊怒之態，亦可恕其既往矣”，“遷怒潔如，噪鬧鎮[整]日”，這說明蔣對兩人矛盾之產生，也負有一方面的責任。而“我為此碧玉，幾病神經矣”、“為情魔纏絆，憐耶？惱耶？”、“亦愛亦憎”、“男女問題，令人不解決如此，其奈之何？”皆表明了蔣對陳的矛盾心理。

在此複雜情況下，又因宋美齡的出現，使蔣陳關係瀕於破裂。從日記內容來看，蔣介石對宋

美齡是真心愛慕的，而宋與陳之間從外貌、學識、品行、修養到家庭背景的巨大落差，必然成為引起蔣移情改變的原始動因。因為有了宋，對陳的愛就有了改變，從愛憐漸變為挑剔，直到橫豎看不順眼，最後將其發配送往美國而結束。

1925年11月底和1926年7月2日，蔣介石又曾召過去的侍妾姚冶誠兩次攜其次子蔣緯國來廣州探望，蔣在7月2日日記中記載：“晚傍回黃埔，以緯國母子來粵也。”<sup>⑤</sup>毛思誠在當日家庭類抄中記到：“旁晚回長洲，以緯國母子來粵也”，其後，蔣介石在審閱時將此句刪去了<sup>⑥</sup>。於是，到了《年譜》正式出版時，僅剩下了“傍晚，緯國省親抵粵”<sup>⑦</sup>這一句話。在此，日記原本、抄本與年譜三種版本內容的變化，非常生動形象地向讀者展示了三者的關係和改動的情況。

於是，從最後的《年譜》稿上來看，一個個人生活情感世界比較清潔完美的蔣介石就此“誕生”了。

三是蔣介石對自己性格缺點的掩飾，以維護自己的正面形象。

在蔣介石日記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自我檢討與反省。除了前述日記中每天必寫的“社會記事”、文後自警之句外，他對於自己性格中的暴躁、多疑、色欲、憤懣及打罵下屬等行為，多有記錄及反省。對於這類記錄，毛抄本中也做了和緩處理，蔣對此是首肯的，但到了《年譜》裡有關這些也已全然不見了蹤影，原因還在於在正式出版品中為蔣掩飾性格缺點以維護其正面形象的需要。當然，蔣介石能在日記抄本中記錄和保留自檢缺點並日日自戒的內容，也是需要勇氣的。可惜的是，看了蔣的日記，給人一強烈的印象就是，他日日自檢自責，但卻不斷複犯，“他也曾設法改正，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sup>⑧</sup>

總的來看，蔣介石對抄本與年譜的審改保留了基本的史實，並做了相應的刪改增，其出發點是基於政治的需要與考慮。現在，我們對於這每一類記錄的改變，如政治、思想、言論、婚姻、家事等等，都可以繼續依據專門的分類，結合各專題的史實研究，再進一步進行細化深入的探討，這對於相關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或將產生具有全新結論的觀點，成為“尋找真實的蔣介石”的前提與史料基礎。

因蔣介石日記原本以及其早期與後期抄本現分藏大洋彼岸及海峽兩岸，有關這一課題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研究，還待海峽兩岸、中外史學界的共同努力。

①毛思誠所著蔣介石《日記分類抄本》及《蔣公介石年譜初稿》等182件檔案資料，在1985年6月7日由其孫毛丁捐獻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現藏於該館特藏“蔣介石個人全宗”。

②毛思誠：《日記類抄》（學行一），封面頁，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三〇四一，115。

③⑧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頁。

④毛思誠：《蔣公介石年譜初稿》，“四十歲，十五年五月至八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三〇四一，33—3。

⑤《蔣介石日記》（原本），1926年7月2日，美國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⑥《蔣介石日記類抄》（家庭類），1926年7月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三〇四一，112。

⑦毛思誠：《蔣公介石年譜初稿》，1926年7月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三〇四一，33—3。

**作者簡介：**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員。南京 210016

**[責任編輯 陳志雄]**